

五位女性与中国现代声乐事业的发展

陈言放

我国的声乐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自己独特的传承方式,不论在歌唱技法、美学理论或艺术流派上都可谓异彩纷呈。当然,我国的传统声乐艺术是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标准而发展的,其主要含括的是我国各类戏剧、曲艺、民歌民谣等领域的演唱艺术,而现代专业声乐艺术指的是与西方文化接轨的音乐教育与演唱艺术。

当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五四新文化运动向传统文化发起了全面挑战,从而使中国新文化艺术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时期。新的声乐教育体制也开始逐步得以建立:1927年11月,国立音乐院在上海的正式创办标志着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体制的建立。“设本科、预科、专修科(师范科)及选科。分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声乐、理论作曲五组。”^①声乐教育成为该校长期坚守并充分展示自己实力的重要领域和我国现代专业声乐教育的始发阵地。

在这个筚路蓝缕的创建时期,一组中国现代女性为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们是周淑安、喻宜萱、黄友葵、周小燕、郎毓秀女士。五位艺术家身体力行的艺术实践,不仅为中国现代声乐艺术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样也以新女性的英姿成为现代妇女走向人格独立和事业成功的一代楷模。

一、取法西方 自立自强

五位声乐女杰的家庭背景颇有共同之处:皆出身于江南的殷实或小康之家,其父辈也皆为当时的开明士绅。在西风东渐的江南,有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并不在少数,也可以说这并不是她们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倘若

没有她们自己独立自觉的人生追求,缺少孜孜不倦、奋发顽强的学习精神,要想在当时的封建文化境遇下学有所成并有所作为,恐怕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代声乐先驱周淑安(1894—1974)的音乐人生就为我们印证了这样的事实。

周淑安出生于厦门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从小喜爱音乐。1911年,周淑安考入厦门鼓浪屿女子师范学校。四年后,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虽然如此,周淑安并不满足于现状。1912年,她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塾。两年后,适逢第一届清华女子官费生招考,她也勇敢地前去应试,在短短两个月里突击学习从未接触过的法文(当时十项考试科目中有一项要考法文)。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成功地通过全部的考试,入选了中国第一批仅有10个名额的官派留学美国的女生行列,成为第一位跨出国门、系统学习西方音乐教育和声乐艺术的女性。

1914年夏,怀着强烈求知欲的周淑安抵达美国旧金山,然后顺利地进入布拉津大学预科班专修英文一年。随后,她考入当时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女校(波士顿的拉德克利夫 Radcliff 女子大学)主修音乐和艺术。同时,她还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选修声乐、钢琴、视唱练耳、作曲理论等一系列课程,利用四年大学的暑假到康奈尔大学师范音乐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音乐教授法。1919年,周淑安还到美国纽约音乐学院专修声乐。通过四年寒窗苦读,她终于获得了哈佛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

大学艺术学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外国音乐学位的中国女性。1921年,周淑安回国任教。1927年,33岁的周淑安仍不满足于已有的学识水平,带着四岁的儿子再度赴美,在纽约著名的皮巴蒂音乐学院师从意大利著名声乐家、声乐系主任米涅蒂学习声乐。1928年她再度回国执教。

紧随周淑安的出国脚步,另一位女歌唱家也迈出了国门,她就是黄友葵(1908—1990)。黄友葵生于清末湖南湘潭的一个翰林之家。受家庭影响,她童年时就会唱京剧,能演奏多种民族乐器。黄友葵10岁开始学钢琴、绘画、书法和小提琴,16岁在福湘女中毕业并留校任钢琴教师。1927年,黄友葵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生物专业,后转入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修生物,副修数学、化学。由于品学兼优,1930年她获得美国阿拉巴马州廷顿大学的奖学金,前往那里主修音乐、兼修美术。作为该校合唱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她还经常担任独唱、领唱和钢琴伴奏,成为该校优秀生组成的“C.西格玛”荣誉学会会员。1933年,黄友葵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国,继续师从上海国立音专的俄籍声乐家苏石林教授学习。周淑安和黄友葵在回国后继续保持的求知欲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成为她们在声乐艺术领域能有所贡献的重要条件。

第三位杰出的女声乐艺术家喻宜萱(1909—)出生于江西萍水的书香门第。1925年,她考入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并听从父亲的建议踏上音乐之途。1928年春,喻宜萱考入由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她的主科老师李恩科先生发现,喻宜萱是块极有声乐天赋的玉璞,就悉心引导她跨入声乐艺术殿堂。1929年夏,喻宜萱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先后师从俄籍声乐教师斯拉维安诺夫夫人(Slavianoff)、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意大利籍指挥帕契(Paci)和周淑安先生。她回忆说:“周淑安先生除了担任声乐课外,还是全校合唱课的

指挥。她的教学内容广泛,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获益匪浅。”^②1933年,喻宜萱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声乐专业毕业生。1935年,为振兴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她婉言谢绝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的邀请,毅然前往美国深造,考入伊萨卡纽约州(Ithaca)康奈尔(Conell)研究生院。她决心充分利用在美的有限时间,更广泛、更有针对性地学些回国有用的课程,便自主安排了四年的留学课程。她主要选择了三类课程:音乐专业课(声乐课、声乐文献、作品分析、对位法、音乐史、合唱指挥和作曲家专论);与声乐主科紧密相关的课(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另一类是教育学、心理学。她所作的论文研究是《中小学音乐教育方案》。可见,她为了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用心良苦。这种自主的学习设计使她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能以主次分明、知识结构健全和扎实的专业能力,得心应手地从事声乐教学事业。

上海国立音专的另两位优秀学生郎毓秀和周小燕在喻宜萱之后也选择了出国深造。郎毓秀(1918—)是浙江杭州人,生在上海的一个艺术之家,幼年受家庭的熏陶,秉承了歌唱天赋。1934年,她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周淑安和苏石林学习声乐。在音专学习期间,她就为高年级学生录制了四重唱《湖堤春晓》并担任女高音声部。1937年,郎毓秀赴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留学,师从戴依斯主修声乐,兼修钢琴。1937至1941年留学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她学习歌剧成绩优异,第二学期就成了全校唯一满分的学生。1946年,郎毓秀再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师范学院音乐系学习两年,获得硕士学位。周小燕(1917—)则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工商世家。小学开始学习钢琴,还学过多种乐器,喜爱唱歌和排剧。

② 喻宜萱《喻宜萱声乐艺术》,华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935年,她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钢琴,后改学声乐。1937年,周小燕赴法国留学,师从意大利籍教师贝纳系迪6年。1944到1945年,周小燕先后师从法国歌唱家佩鲁贾夫人、玛经夫人钻研法国艺术歌曲和西洋歌剧。“1946年到1947年,我在法国、英国、卢森堡、德国、捷克、波兰等国举行音乐会后,决定回国。当时有人劝说我在外国定居,我拒绝了,我不愿留在异国当‘白华’。”^③

由上可见,五位杰出女声乐艺术家几乎都是从中国现代艺术的重镇——上海出发,开始了自己清醒的寻梦之旅。无论她们在美洲还是在欧洲,都能独立自觉地择师和选课,从而摆脱了艺术家追逐虚名的累赘,这种冷静的抉择不正是当今我们许多艺术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素质吗?

二、业系国运 德艺双修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女性艺术家们呈现出三类较典型的特征:一是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以改造现实社会为己任;二是接受“主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以建立新文化为目标;三是以艺术修身养性、作为高雅消遣的“闺阁派”。

上述五位声乐艺术家是怎样闯出历史的洪流与羁绊,谱写自己精彩的音乐人生呢?首先,她们都将自己的艺术成就紧紧维系在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之上,展现出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卓越的巾帼英姿。她们的事业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为后学者带来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影响。

1921年,周淑安回到祖国,开始了她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启蒙工作,先后在广东女子师范学院、上海中西女塾任音乐教员。1925年到1927年,她还在厦门大学任教,兼任合唱指挥,成为厦门大学最早的音乐教师之一。1928年,周淑安再度学成回国,即被上海国立音乐院聘为声乐组主任,她以极大的热情超负荷地全面开展专业音乐教育工

作。除了行政工作外,她还担任声乐主课、合唱指挥、视唱练耳课,举办独唱音乐会,给学生做钢琴伴奏,还组织女子歌咏团并亲任指挥。“她走到台上,指挥棒一挥,合唱队员精神振作起来,大有万窍齐出,山鸣谷应的声势”^④。1928年,她率队参加上海举办的纪念舒伯特逝世100周年的合唱比赛,力挫英、法、俄、德代表队,勇夺第一名,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九一八”事变后,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唤起民众的抗战激情,支持抗战,还创作了《抗日歌》、《同胞们》、《不买日货》等作品,组织学生上街宣传演出,为抗日募捐奔走呼号。周淑安以身作则,极大地影响了国立音专师生们的爱国激情,以致许多师生都投入创作、演唱抗日题材作品的行列中,树立起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而年轻的黄友葵于1933年放弃了在美国已打开局面的良好势头,毅然踏上归国之途。她在东吴大学创办音乐系,以精湛的声乐造诣在上海、江苏等地举办独唱音乐会,组织合唱队,担任许多音乐会的主角,被当时音乐界誉为“中国第一女高音”。彼时有外国专家欲资助她去意大利深造,也有的欲聘其去美国发展,都被她一一谢绝。之后的数十年,黄友葵为祖国音乐教育及声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一代宗师、杏坛楷模”。

喻宜萱留学期间,曾在美国纽约、费城、旧金山等地举行过多次独唱音乐会和广播演唱,而且是最早在美国演唱中国民歌和抗日救亡歌曲的中国女性歌唱家,影响颇大。1939年,她“一结束康奈尔大学的学习,立即决定返回遍地燃烧着抗日烽火的祖国。这时一些美国朋友劝我留在美国过舒适安逸的生活,以免遭颠沛流离之苦。但我想危难之中的祖国和饱尝困苦的亲人们,我绝不能在事成学就

③ 周小燕《我是幸运的》,载《音乐艺术》1988年副刊。

④ 廖崇向编《乐苑谈往》(廖辅叔文集),华乐出版社1996年版,第78—81页。

之后,在外偷安,追求安逸平定的生活,我并不知道回国后能做什么,但我觉得我应该回来,应该和自己同胞们在一起,做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⑤。回国后,她先后在多所院校任职,并在各地举办独唱音乐会,演唱了大量抗日救亡作品和民歌,影响非常之大。1945年她还曾辞去教职,专门从事演唱,以推广、促进、提高人们对现代声乐艺术的认识水准和欣赏能力。这也是她有别于其他歌唱家的一大创举。1953年,她又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在阵地上为志愿军战士歌唱。如今已年近百岁高龄的她,还时时关注着中国声乐事业的发展。

1941年,当郎毓秀以优异成绩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后,婉拒了老师和同学的热情挽留回到了上海,开始用自己的歌声为抗战助威,为民族呐喊。她曾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成都、重庆等地开独唱音乐会。她说,“我在这些城市开音乐会,给饱受战争苦难的人民带去一点欣慰,每当看到观众们露出笑脸的时候,我想总算是为抗战尽到了自己的微薄之力”。新中国成立后,她任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四川音乐学院)教授、系主任。1953年她以火热的爱国激情参加第三次抗美援朝慰问团,赴朝演出达四个月之久。

周小燕1945年学成后,登上了巴黎国家大歌剧院的舞台,以精湛的技艺和美妙的歌喉,征服了挑剔的法国听众,后又在布拉格之春上获得很大的成功,被誉为“中国夜莺”。1947年10月,周小燕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回到了祖国,开始在各处举办独唱音乐会,并到复旦、交大、同济、震旦、浙大等高校,为进步学生筹款义演,人们献给艺术家的一面面旗子上写着“唱破阴暗的天”、“从黑夜等到黎明”等振奋人心的词句^⑥。1949年她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后任系主任、副院长等职。作为一位老艺术家,已年届九旬高龄的周先生仍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勤勤恳恳地培育着下一代声乐人才。

上述五位现代声乐领域的优秀人物,她们虽没直接在战场上参与舍生取义的民族战争,但她们却以高尚的人格和专业特长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谱写了昂扬的青春之歌,同时也奠定了我国现代声乐发展的广泛基础。

三、异花齐放 殊途同归

从第一代声乐教育家周淑安的启蒙、开拓开始,到第二代教育家的继往开来,这五位艺术家既是一代宗师,又都曾是各单位管理核心的中坚。因而,她们开阔的教育理念,严谨规范、渊博细致的教学水准和要求,专心致志地研究探索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崇高的人格魅力等,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国专业声乐教育的建设与发展。

这五位女声乐艺术家彼此在师承关系和学术风格上多有内在联系,这种关系凝结出了中国早期声乐教育的一些代表性的特色。如她们都很注重系统化的练声授课;很讲究对声乐作品精研细琢,尤其重视咬字、吐词;也很注重传统的欧洲声乐技法与祖国传统音乐美学意蕴相融合。在早年富有成效的艺术实践之后,她们把后半生无一例外地投身到了教书育人的时代需要中。非但如此,她们还积极著书立说,为中国声乐向民族化、国际化、现代化和体系化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周淑安以时代赋予的机遇,开创了中国现代女性在音乐领域发展的众多第一:第一位研究欧洲传统声乐艺术的女声乐教育家,第一位中国女合唱指挥家,第一位女作曲家,第一位女声乐教授等。周淑安将其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为声乐教育的开拓和普及培养了众多人才。上已述及的女歌唱家喻宜萱和郎毓秀等都曾是她的弟子,后来的著名女歌唱家张权也曾师从于她。

⑤ 同注②。

⑥ 同注③。

周淑安特别注重儿童音乐教育,为此她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创作儿歌,如《早晨歌》、《小老鼠》、《天地宽》等。她创作的每首歌曲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黄自先生曾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她的歌里“音乐与诗的情感是完全吻合的”,“像这样的歌曲,才算艺术作品,才能给我们认识音乐的真意义”。^⑦周淑安在五位艺术家中最具有独特贡献的就是她在音乐创作上的成果。除了抗战作品外,她的艺术歌曲、儿童歌曲创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如《安眠歌》、《坚劲歌》、《乐观》、《佛曲》(合唱曲)和一些儿童歌曲,都注重采用民族音调、和声、配器去构思,成为现代中国音乐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组成部分。

周淑安是最早开始从事声乐教育民族化的先驱,她的论文《我的声乐教学经验》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她出版的作品集包括:1931年和1936年选编的《英文复音合唱歌选》和《舒伯特歌曲集》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5年她的《儿童歌曲集》四册由开明书店出版;《抒情歌曲集》、《恋歌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可惜的是,周淑安还有一些创作的作品和翻译作品毁于战火,有的毁于“文革”。^⑧

相对于周淑安,其他四位声乐艺术家在演唱领域有着更多的经历。如黄友葵将“美声学派”同中国民族唱法相结合的研究,以及发展民族声乐的教育方面都很有建树,她的专著《论歌唱艺术》、论文《论声乐艺术的学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谈音乐教育中的洋为中用问题》至今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研究中国声乐史不可或缺的经典文献。喻宜萱作为中国现代专业声乐教育培养的第一届女毕业生,不仅注重学习演唱西方作品,也特别注重传播和演绎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她开创了演唱我国现代艺术歌曲的先河,对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注意到,普及音乐不能仅靠有限的学校教育,还要大力培养广大听众的欣赏能力。因

此,她曾暂时放下教职、集中全部精力专门从事舞台演唱,足迹遍及国内各大城市。上世纪50—60年代,她一边教学一边依然坚持到全国各地巡演。据不完全统计,喻宜萱在国内外举行独唱音乐会多达八十多场,参加过的综合演出就难以计算了,这在第一代有影响的中国歌唱家中是十分罕见的。作为音乐教育家,喻宜萱不仅培养了众多声乐人才,同时在声乐教材的建设和声乐理论研究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她坚持“双百方针”,主编并纠正了1949年前专业声乐教材多为外国声乐作品的缺陷,主持编辑了《中国歌曲》、《独唱歌曲集》、《声乐教学曲选》等中国声乐教材;还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译配出版了《法国艺术歌曲》、《外国歌曲选》、《西班牙歌曲集》和《西洋歌剧咏叹调选集》等外国声乐作品教材,总数达二十余册,为我国专业声乐教材的建设起到了开拓性的积极作用。她还曾发表《我对声乐教学问题的一些看法》、《声乐教学漫谈》、《美声歌唱》、《法国艺术歌曲》等数十篇论文,翻译《当代歌唱艺术的问题与展望》、《声乐作品的释义与表演》,对声乐表演与声乐教学提出了很有价值、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见解。她的著作《我与音乐》、《喻宜萱声乐艺术》,影响面很广。而周小燕先生在培训人声最难训练的声部男高音领域,有着一套卓有成效的方法。1988年已届七十岁的她为了振兴中国歌剧事业,还创办了“周小燕歌剧中心”,亲自出任艺术总监,为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学子能回国演唱、为国内学子的实践搭建了一种新模式。另外,由周小燕主持审定的各声部外国歌剧选曲集已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影响深远;由周小燕主讲的声乐VCD、DVD教学光盘更受到广大声乐学习者的欢

⑦ 同注④。

⑧ 丁汝燕《中国现代声乐艺术教育的开创者——周淑安,赵梅伯》,《中国音乐》2006年第3期,第110—112页。

迎;她的论著《当代世界音乐发展的趋势给我们的启示》、《男高音中声区和换声区的训练》、《我是幸运的》回忆录、《声乐人材培养中应注意的问题》、《对当前音乐演唱的风格说几句心里话》等,至今都是很好的声乐文献。郎毓秀是我国著名的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她擅长演唱西洋歌剧、外国民歌和艺术歌曲。由于她长期潜心向曲艺艺人学习,为探索中西演唱方法做过深入研究,因而还工于演唱中国创作歌曲、中国歌剧、民歌、戏曲、曲艺选段。1934年,她曾为影片配唱和为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天伦歌》、《杯酒高歌》、《乡愁》等数十张唱片,曾风行亚洲华语地区。作为声乐教育家,她六十多年的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歌唱和教育人才。她精通英、法、德、意四国语言,已出版的主要译著有P.M.马腊费奥蒂的《卡鲁索的发音方法》、I.沃伦的《声乐应考手册》、E.普丽兹的《伊莉莎白·舒曼的教学》、《玛丽亚·卡拉斯生平》等,编译的《西洋艺术歌曲二十首》则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欧洲学派的歌唱家。

综观五位艺术家的足迹,她们确是我国现代声乐史上优秀的女性代表。她们崇高的爱国品质、深情的民族文化信仰、独立执着的艺术品格与精神、出色的教学水准都深深地激励着21世纪的中国声乐艺术家们。她们以女性对歌唱艺术特有的理解力和天赋,掌握了西方传统声乐艺术的真谛。更可贵的是,她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或以此为谋生手段,而是将学来的一技之长,笃实求新地运用到报效祖国和启蒙、培育人才方面,以展现她们的人生价值。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她们在声乐艺术造诣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既艺术视野开阔——在她们教书育人的生涯中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精神,又同时兼容了西方进步的教育思想。其次,在文化方面的共同特征。她们既有扎实的国学底蕴又有较高的多国外语水平,对国外声乐文献中蕴涵的世界文化有着深入而精辟的认

知和诠释能力,这就能使她们的学生博取更丰富的声乐营养,而不仅仅局限在传统音乐中。她们虽然熟悉西方声乐文化,可是她们也同样珍重民族的艺术传统和风格,始终坚持声乐发展的科学化和民族化进程。相对于食洋不化、崇洋媚外的少数艺术家的不良思想而言,她们崇高、求实的价值观深深地融入了新中国的音乐教育和声乐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更是我们今天应当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再者,珍惜人才、发现人才、努力培养人才也同样是她们的共同特征。她们的声乐观始终坚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而对于当下业界出现的少数所谓艺术能人,专业上投机取巧、胡吹滥造,对学生造假惑众、巧取豪夺等现象形成极大的反差。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她们才能为祖国培养出一大批贡献卓著的优秀艺术人才和众多的普及型教育人才。

我国现代声乐艺术从上世纪20年代起到今天已历经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专业声乐教育机构从仅有一所国立音乐院发展到除港澳台外的九大专业音乐学院,加上各省、市、自治区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中星罗棋布的音乐学院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规模和体系。年轻的歌唱家们频频在国际歌坛摘金夺银,众多优秀歌唱家得到听众的认可,这些都离不开五位前辈贤达言传身教、辛勤耕耘的惠泽。如今,她们的学子、学孙已成倍地繁衍成长,代代相传,多数已成为我国音乐文化领域里的中坚力量,还有的成为像她们当年那样的歌唱家,活跃在国内外歌坛。因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述五位杰出女性作为我国现代声乐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作为第一、二代声乐艺术家和教育家,她们为我国现代声乐今天出现的大好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更为中国女性树起了自尊、自强、自立、自爱的旗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艺术学院